



“世界 一流 军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比较的概念，是共性和个性、相对和绝对的统一，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职能属性、组织属性、技术属性、文化属性。我军要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必须全面把握这些基本属性，巩固我军政治优势等传统优势，打造新的组织优势、技术优势、文化优势，使我军成为能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与世界的和平的雄师劲旅。

□ 张明仓

政治属性

政治属性是军队的根本属性。政治上进步与否，从根本上决定着强军事业的成败，决定着一支军队能否成为一流军队。当一支军队政治上失去先进性时，军事上必然走向衰弱，甚至迅速败亡。

建军90年来，我军不断发展壮大、迭克强敌，最根本的，就是靠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靠官兵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发挥出巨大的政治优势。但政治优势过去有，不等于现在有、永远有。习近平主席指出，党在新形

势下的强军目标中，“听党指挥是灵魂”“作风优良是保证”，都意在强调保持我军的政治性质、政治本色、政治优势。巩固和拓展政治优势，是我军迈向世界一流的首要任务。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需要借鉴外军经验，但绝非某些人宣称的那样“以美军为样板”“全面学美军”，而要保持我军特色和优势，坚定不移走习近平主席开辟的新形势下政治建军道路。习近平主席领导召开古田全军政工会，确立了党在强国强军进程中政治建军大方略，开创了新形势下政治建军道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必须把政治建军作为立军之本，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指挥。

职能属性

职能属性反映军队的职责使命和核心价值。习近平主席强调，我军要“忠实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忠实执行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这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我军提出的战略任务，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我军的对内对外职能。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体现了有效履行我军职能使命的迫切需要。

当前，我军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相比差距也不小，与世界先进

军事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打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的问题依然突出。习近平主席鲜明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既突出强调我军的根本职能，也切合有效捍卫国家根本利益、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的现实需要，体现了中华民族百年强军梦的实质。

强军兴军、迈向一流，必须着力锻造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军事能力，努力使我军核心军事能力建设实现跨越发展，使任何强敌不敢攫其锋芒。为此，要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围绕能打仗、打胜仗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加快打造以精锐作战力量为主体的军事力量体系，提高部队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要统筹抓好实战化军事训练与战斗精神培育，引导官兵把练技能、练战法与练精神、练作风结合起来，克服松懈麻痹思想，锻造战斗血性，使部队练就坚强的战斗意志和过硬的打赢本领，确保有效慑敌制敌。

组织属性

组织属性直观反映军队现代化水平。军队作为武装集团，组织结构合理、组织功能强大，是其凝聚力、战斗力、发展力的重要支撑。没有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就没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任何一支军队，如果组织结构松散、组织功能弱化，就必然走向衰败。

过去讲我军的组织优势，通常指党的组织优势，这是我军必须始终保持的特有优势。同时，领导管理体制不科学、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不健全、力量结构不合理、政策制度相对滞后等，凸显为制约强军打赢的重要短板。

我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需要发挥好“两个组织优势”：一是党的组织优势。通过全面加强军队党的建设，解决党组织功能弱化问题，重焕党组织威信威力；二是军队组织形态优势。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就是要牢牢把握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这个指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要深入推进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构建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实现整个军队组织架构的重塑。要坚持精兵作战、精兵制胜，优化我军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为新型作战力量“腾笼换鸟”，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要加快推进以效能为核心的军事管理革命，提高军队专业化、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水平，推动我军加快实现整体重塑、跨越发展。

技术属性

技术属性在现代军队构成中更加重要。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推进，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引起了战争形态和作战方

式深刻变化，日益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伊拉克战争等现代战争反复表明，当两支军队形成“技术代差”时，落后方几无还手之力，很难“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美国早在1958年就设立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专注于“改变游戏规则”的颠覆性技术研发；2012年成立国防部战略能力办公室(SCO)，意在“提供颠覆性能力”，创造对敌人的“技术突袭”；2014年提出“国防创新计划”，企图以技术上颠覆性突破维持美军绝对优势。我国要防止同军事强国形成新的技术鸿沟，就必须迎头赶上，下更大气力推动科技兴军。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亟须在军事技术上实现“两个转变”。一是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加强前瞻性、先导性、探索性、颠覆性的重大技术研究和新概念研究，加紧在一些战略必争领域形成独特优势，努力实现“弯道超车”。二是由“以劣胜优”向“以优胜优”“以优胜劣”转变，在保持“政治先进性”同时，全力打造“技术先进性”，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打造强大的技术引擎。这将彻底改变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因技术装备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从根本上掌握世界军事竞争的战略主动权。

文化属性

文化属性是军队发展的深厚根基和持久动力。建设一流军队，须臾离不开一流文化特别是创新文化的引

领。创新文化是世界新军事革命的灵魂。《美国国防部转型计划指南》把“通过创新性领导进行文化转型”列为三大转型战略之首，美国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就是要通过创新赢得新的绝对军事优势。俄罗斯提出“创新型军队”建设理论。审视国际军事竞争，我军与强国军队的差距，表面看 在技术装备，深层次看在体制机制，根本上看则是创新文化。

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我们强大的软实力。同时，消极防御的战略思维、重道轻器的思想倾向、贪图安逸的人生态度、逆来顺受的“不争”哲学等消极文化的负作用也不时显现，成为制约强军的文化障碍。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必须克服各种消极文化因素的影响。

创新的时代呼唤创新的文化，国际军事竞争唯创新者胜。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亟须把弘扬创新文化作为重大战略任务抓紧抓实，使创新真正成为引领军队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大力弘扬创新精神，构建以“能打胜仗”为根本目标的军事创新体系，完善军事创新的动力机制、激励机制、调控机制、保障机制、评估机制，营造勇于创新、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不断提高创新对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使创新文化成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强大引擎和有力支撑。

军队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战斗文化

□ 张杰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与军国主义日本之间，在20世纪上半叶进行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这种历史背景决定了抗战时期我们民族的战斗文化，既是全民族空前团结、一致对外的，也是坚决抗争、誓死不屈的；既是崇尚英雄、鄙夷汉奸的，也是一心抗战、服务打赢的。

“要生存，不要亡国”，为民族存亡而战

1927年7月25日日本内阁大臣田中义一上奏日本天皇的《田中奏折》就明确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当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将这份日本的最高国家机密文件曝光时，日本人灭亡中国的野心已经毫无遮掩地暴露在中国人面前了。虽然与当时的日本相比，中国的军事实力还比较弱，但四万万中国人用同一个声音喊出了“要生存、不要亡国”的口号。全国人民争先恐后地为抗战献智出力。当时上至高官显贵、学者教授，下至农夫工友、苦力挑夫，到处都有舍身救国的感人事迹。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战中共歼灭日军150多万。抗战，是全民族的伟大觉醒，是民族精神的凤凰涅槃，是全国国家精神的重生。“为民族存亡而战”这个声音，不仅在当时穿越了省份、国界的地理界限，长久地回荡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耳边，而且在今天，它也应该穿越时空的界限常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要当英雄，不要当汉奸”，誓死不做卖国贼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中国的土地上，先后出现伪满洲国溥仪傀儡政权、华北伪政权、南京汪伪政权等。然而令人欣慰的是，“要当英雄”“誓死不做卖国

贼”却始终是全民族的主流意识，涌现出了大批的抗战英雄，他们的事迹彪炳青史。比如，南苑激战，国民革命军守城官兵拼死抵抗，伤亡5000余人，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等高级将领拼死力战壮烈牺牲。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英雄更是不胜枚举，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指挥部队掩护后方机关突围时，被日寇的炮弹击中而壮烈牺牲；东北抗联总指挥杨靖宇忍饥受冻战斗至死，当敌人剖开他的胃，里面全是树皮草根与棉絮。应该看到，英雄文化有其生长的沃土，对于中华民族来讲，没有任何一个外国强权能阻止英雄文化的繁衍和传承。

“要服务战争，不要脱离实际”，一切文化要对抗战有利

在抗日战争时期，如果说，有哪一项文化活动或者文艺作品脱离了抗战这个大背景，那么，无论它本身多么的优秀，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以抗战为主题的文化作品不断涌现，如文学作品《边区自卫军》《平汉工人破坏大队》《铜墙铁壁》等，音乐作品《八路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八百壮士》《大刀进行曲》等，戏剧作品《保卫卢沟桥》《刘胡兰》等，这些作品无不蕴涵着爱国抗日、殊死抗日的战斗意志，激励着一批批抗日儿女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当时文艺工作者在农村进行演出，对群众的影响很大，有些青年农民看到表演中敌人的残暴行为，激起了对敌人的仇恨，当场报名要参军抗日。比较典型的例子是，1941年1月新四军四师拂晓剧团在安徽涡阳县演出东北义勇军抗日题材的小戏《三江好》等，当唱到“高粱叶子青又青，九一八来了日本兵……从那个悲惨的时候，离开了我们的家乡……爹娘阿……”时，台上台下一片哭声，最后大家愤怒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一历史时期，固然抗日离不开文化，但文

化同样也离不开抗日这个主题。拥护抗日、响应抗日、支援抗日、投身抗日的文化大潮，使四万万中国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重新团结和凝聚在一起，而这正是抗日的战斗文化的最高历史使命。

“要独立自主，不要任人摆布”，把抗日的枪杆子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

经过大革命失败、“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越发地认清了一个真理：枪杆子只有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才能为人民所用。抗战爆发之初，我们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大肆鼓吹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统一政令军令，别有用心地提出红军改编后部队的管理教育直属蒋军行营等无理要求。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强调：“在统一战线长期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从各方面影响和吸引共产党及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1937年8月1日，党中央和军委总部在一天之内发出三份文件：《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红军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这三份文件都强调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在统一战线条件下，在红军改编后，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保持，共产党员不许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动摇。正是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指战员在抗日战争期间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建军原则，对“人民军队听谁指挥”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对国民党的利诱、拉拢、威逼、蚕食等种种手段进行了有效防范，才把抗日的枪杆子牢牢掌握在了人民手中。

军事历史

1999年8月至2000年12月，俄政府和军队为彻底消灭车臣非法武装，发起第二次车臣战争。此次战争是俄联邦武装力量与其他强力部门联合进行的一场大规模反恐恐怖特种作战。俄政府和军队充分吸取了第一次车臣战争失败的教训，精心准备、缜密筹划，歼灭了大部分车臣非法武装分子，总体上控制了车臣地区，初步达成预定战争目的。行动坚决，上下同欲。1994年第一次车臣战争时，俄政界对出兵车臣存在严重分歧，俄军高层对出兵车臣态度不一，反对者居多，官兵斗志不高，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和结果。第二次出兵车臣，几乎得到了俄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究其原因，主要是极端民族分裂分子的恐怖行径使大多数俄罗斯人意识到必须尽快解决车臣问题，打击分离主义者和消灭恐怖分子，保持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稳定。俄当局高举“反恐怖主义、维护国家统一”的旗帜，师出有名。

活用战法，巧妙敌敌。俄军汲取了第一次车臣战争轻敌麻痹、急于冒进的弊端，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多路挤压的战法，将进攻与清剿相结合，强化占领区秩序与巩固战区后方相结合，不给车臣武装分子以可乘之机。行动中，机械化部队每日只推进10—15公里，每攻占一地，立即进行巩固。在完成对格罗兹尼的包围后，俄军没有急于进攻，而是封锁围困，使用空中打击使其断水断电，变成一座死城，为最后攻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判断格市之敌有突围的迹象时，俄军又采用虚留生路、巧设伏击的战法，放他们从格罗兹尼西南撤出并进入山区，2000多名武装分子钻进了俄军的“口袋”，遭到毁灭性打击。

远程突击，精确打击。俄军利用航空兵、远程火炮和地对地战术导弹对恐怖分子的各种目标进行远距离、非接触性的打击，力求先消灭恐怖分子的活动基地，摧毁其通讯、交通、经济设施，使恐怖分子陷入瘫痪状态，再对其一网打尽。与此同时，俄军还充分发挥其在技术领域的绝对优势，运用大量精确制导武器对车臣恐怖分子进行精确打击。据外电报道，俄军使用了几十颗军用卫星保障此次军事行动，车臣恐怖分子的一切活动和所有固定目标都在俄军侦察飞机和侦察卫星的严密监视之下。作战中，俄航空兵在侦察卫星、侦察飞机实时提

供情报的条件下，大量使用KAb-500和KAb-1500精确制导炸弹、油库炸弹等对敌雷达、油库、电视台、武器弹药库、匪首住所等目标实施精确打击，以求尽量减少打击目标周围居民的伤亡。

重视宣传，争取群众。俄军认真吸取了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教训，非常重视利用媒体大力宣传军事行动的意义。专门成立了北高加索新闻中心，及时报道俄军战绩，鼓舞士气，赢得民心；普京还多次发表讲话，称俄“不是在同伊斯兰教徒，而是在同恐怖分子作斗争”，强调俄军遂行的是“捍卫国家统一，维护俄国家利益”的正义行动；同时，俄军用精确制导导弹摧毁了进行分裂宣传的车臣电视台，使车臣当局成了“哑巴”，确保了俄方无论在舆论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时刻掌握主动权。有效的宣传对争取民众支持起到了积极作用。车臣民兵组织了2000多人配合行动，在对格罗兹尼的攻坚战中，冲在最前面的不是正规军，而是熟悉该城底细的600名车臣民兵。

外交斡旋，孤立敌人。战争开始后，俄外长立即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八国集团、独联体、欧盟以及某些伊斯兰国家的外长，强调任何对恐怖分子的支持都将被视为粗暴干涉俄内政；为防止某些伊斯兰教组织向车臣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持，俄外交部召见了一些阿拉伯国家驻俄使节，指出“车臣武装分子以宗教为掩护，从事与宗教毫无共同之处的恐怖活动，教友不应予以支持”，希望这些国家的政府“能够采取有效措施，以杜绝庇护车臣犯罪组织的活动”；俄还派特使前往伊朗、巴基斯坦、沙特等国，阐明俄在车臣的行动“完全是针对恐怖分

子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与车臣接壤，经两国边界不断有武器弹药流入车臣，为堵住这一漏洞，俄外长紧急出访格、阿两国，就共同防范和打击极端民族分裂势力达成共识，并签署了三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协议。通过这些外交活动，俄得到了一些国家的理解，为顺利进行军事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例启示录

第二次车臣战争评析

□ 林陈彬 张苗